

*Sinologia Hispanica, China Studies Review*,  
8, 1 (2019), pp. 63-74

Received: March 2019  
Accepted: May 2019

## 菲律宾中文刻本《格物穷理便览》的藏本及作者探源

## A Research on the Copies and the Author of the Philippine-Published Chinese Incunabula: *Symbol of Faith*

肖音\*

xiaoyin87@nankai.edu.cn

Xiao Yin\*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中国, 300381

*Nankai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China 300381

---

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马约尔于1607年在菲律宾出版了中文刻本《格物穷理便览》。本文探究了该刻本目前的藏本情况，整理并辨析有关该书作者马约尔修士的文献，尝试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并结合现已发现的菲律宾中文刻本，考察文献中提到的马约尔修士的作品。

**[关键词]** 菲律宾；中文刻本；《格物穷理便览》；托马斯·马约尔

---

The Spanish Dominican Thomas Mayor published his *Symbol of Faith in Chinese Language (Gewu Qiongli Bianlan)* in 1607 Philippines. This article studies its present copies conserved in different libraries around the world indicated in earlier reports. It will also try to bring forward some new points of view about several debatable questions on the biography and the publications of this Spanish Dominican author through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archives about him dating up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s well as all the discovered Philippine-published Chinese Incunabula in the present.

---

\*肖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中文刻本和中西翻译。

**Key Words:** Philippine; Chinese Incunabula; *Gewu Qiongli Bianlan*; *Symbol of Faith*; Thomas Mayor.

多明我会菲律宾的对华传教出版物是其向中国大陆传教活动的文化准备与实践前奏，因此，研究西班牙托钵修会在马尼拉刊刻的传教文本，有助于从各修会传教政策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去深层挖掘震动中欧的“礼仪之争”的根源。相较于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研究，目前国内对同时期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的关注度还不够。

自1565年西班牙人开始正式征服菲律宾群岛，到1632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最终得以在大陆传教，西班牙传教士一直希望能够把福音带到东方古国中国，因而有计划地准备了一系列传教文本。这些文本既有其独特的文献与历史价值，见证了菲律宾印刷业从无到有的诞生，亦有很好的内容针对性和传教对象覆盖面，自成体系。目前已发现四部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对华人传教的中文著作：《辩正教真传实录》（高母羨，1593）、《基督教义》（多明我会修士，出版年份无法确定）、《僚氏正教便览》（多明戈·得·尼埃瓦，1606）和《格物穷理便览》（托马斯·马约尔，1607）。

其中《格物穷理便览》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详细的论述在明末时期算得上是一部西学的中文巨著。该书有十四万余字的篇幅，分三卷，不仅囊括当时的基督教教理，还介绍了西方物理、地学、天文、动植物、人体解剖学等科技知识。此外，它第一次把诺亚方舟的故事、亚伯拉罕、出埃及记、以色列历史、西方著名圣徒事迹等《圣经》故事详细地介绍到中国。对亚当、夏娃、耶稣以及基督教教理的介绍也比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1584）和早于它出版的多明我会的《基督教义》要详细得多。

本文将对《格物穷理便览》其书的成书时间和藏本现状做一最新的研究报道。并辨析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相关文献对于该书作者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生平及其作品的不同记述，尝试解决有关作者生平的几个疑点。

## 一、成书时间及其出版

《格物穷理便览》的中西文封面都指明该书1607年出版，出版地是菲律宾马尼拉的比农多（**Binondoc**）地区，由“华人基督徒”佩德罗·维拉（**Pedro de Vera**，中文名不详）出版。从书前的教会、总督出版许可来看，最早的证明文件日期为1606年11月19日，由埃莱拉（**Herrera**）神父签署，最晚的文件日期为1607年5月26日，由教区总长哈辛托（**Miguel de S. Jacintho**）签署。可见该书的写作最晚完成于1606年11月以前，而出版则在1607年5月以后。

该书应该是自1604年就已经开始了创作，因本书第七页a面作者提到“予自前年来此吕宋到今，永常与汝唐人同住，亦谙汝唐人之语多少”。根据菲律宾多明我会对托马斯·马约尔的传教纪录，他是1602年来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既然这里说“前年来此吕宋”，说明前言部分是1604年写的。本书第二卷页136a有这样一句话：“今自万历三十四年，算至禹，共有三千九百单一年。”万历三十四年是1606年，可见直至1606年，该书仍在创作过程中。另外，该书页243a提到当时现任教皇名叫“奇厘民治”，应是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e VIII**），他1592年至1605年3月间在位，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教皇去世的消息传到马尼拉可能滞后，该书应是在1604-1606年间写成。不大可能更早，因为托马斯修士1602年才来到菲律宾，开始在中国侨民中间传教，学习中文并达到可以用中文写作需要一定时日，两年时间已经很惊人了。

## 二、藏本现状

荷兰汉学家范德龙在他的研究中公布了《格物穷理便览》现已发现的三个藏本：其一是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布道者修道院（即多明我会的修道院）。范德龙参考了雷塔纳（**Retana**）1911年《菲律宾出版起源》一书，其中讲到瓦伦西亚文献学家希梅诺（**Vicente Ximeno**）曾于1747年在《瓦伦西亚作家（**Escritores de Valencia**）》一书中声称曾在该地远远地看到过这本“三指厚”的书。不仅如此，在希梅诺的作品中，他还准确地指出“该书是1607年在比农多（**Binondoc**）由佩德罗·德·维拉（**Pedro de Vera**）出版……封面、赠言和出版许可证是欧洲语言，其它部分用的是中华帝国的通用语言，从左往右读，和希伯来文书籍一样。因而这部作品是从通常的结尾处开始的。”面对如此准确细致地描述，无疑希梅诺确实在1747年亲眼见到过这本书。据雷塔纳的说法<sup>1</sup>，希梅诺看到的这个藏本的一部分后来被转移到瓦伦西亚人民之家，二十世纪初那里有一部缺少封面和前言的中文书，当时能见到该书的人无法确定人民之家的残本中文书就是托马斯·马约尔的《格物穷理便览》。即便如此，雷塔纳料想瓦伦西亚人民之家的那本中文书可能就是希梅诺看到的《格物穷理便览》。但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怀疑的。本文作者于2018年7月亲自去瓦伦西亚布道者修道院、瓦伦西亚大学历史图书馆和瓦伦西亚市政府档案馆<sup>2</sup>做过调查。如今上述机构的图书管理都已经电子化，笔者也得到了这些机构的图书和档案管理员的帮助，但经过多方努力，仍未在其目录中查到此书。

<sup>1</sup> 西班牙内战前常见的类似于工会或文化活动中心的机构。

<sup>2</sup> 西班牙内战前的社会机构“人民之家”现已不存在，瓦大图书管理员认为“人民之家”的书籍现应保存在瓦伦西亚市政府档案馆。经亲至，其中的确保存有很多古籍，但未见《便览》的踪迹。

笔者相信，1747年《格物穷理便览》的一个藏本的确在瓦伦西亚被希梅诺见到过，但它很可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遭到破坏或遗失，亦可能已被藏书家购买。雷塔纳报道的那本二十世纪初在人民之家被发现的中文残书，当时就不完整，没有人能够辨认它到底是什么书，作者是谁。即使它正是《格物穷理便览》的残本，后来也很可能因为无法辨认没有被编入电子系统，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可以说，所谓《格物穷理便览》的瓦伦西亚藏本如今事实上已经遗失了。

范德龙提到的第二个藏本现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该藏本缺少前十页，其中夹着一页说明文档，表明该藏本有可能原是由荷兰藏书家米尔曼（Gerard Meerman, 1722-1771）收藏。米尔曼的儿子约翰·米尔曼（Johan Meerman）死后，米尔曼家族藏书于1824年被拍卖。《格物穷理便览》以100.25盾的价格成交，但买主姓名未知。该藏本由莱顿大学图书馆于1886年后购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转移至莱顿大学的汉学院，九十年代重新回到大学图书馆。

第三个藏本现存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原藏维也纳皇家图书馆。这一藏本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中文和西文的封面和出版许可说明。经过比对，该藏本与莱顿大学的藏本是同一刊刻版本。

### 三、作者生平

《格物穷理便览》的作者托马斯·马约尔（Tomás Mayor）修士出生在西班牙阿拉贡省（Aragón）哈蒂瓦镇（Jativa），求学于瓦伦西亚（Valencia）省阿里坎特（Alicante）市下属的一个市镇奥利维拉（Orihuela）。于1602年4月30日作为第七批登录菲岛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同行34人）登陆马尼拉，受命在比农多（Binondoc）区的华人和他加禄人（菲律宾土人）中从事传教和管理工作。他1608-1610年间担任该教区的副主祭（vicario），并于1610年被选为教区监事（definitor）。根据文献记载，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精通中文和闽南语，其水平之高令澳门主教和葡萄牙传教士惊叹。1612年他应当时澳门主教平托（Friar Juan Pinto da Piedade，葡）之邀，在他的保护下，来到澳门传教。但澳门的教派和传教机构千方百计阻止多明我会修士进入中国传教，对马约尔修士和与他同行的马丁内斯（Bartolomé Martínez）修士非常敌视，他们在澳门的传教活动和进入中国传教的尝试被屡屡掣肘。很快，来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被排挤出澳门。于是马丁内斯修士返回马尼拉，托马斯·马约尔则决定取道印度返回欧洲并报告这种情况，以寻求帮助。然而在回程途中马约尔修士不幸遇难，具体遇难地点无法查明。

关于马约尔修士的生平，现在可以见到的历史记录非常有限，就连他何年出生都丝毫找不到记录。但他的出生地、求学地、1602年登录菲律宾岛、1612年赴澳门传教的挫败经历，均来自于明确的档案记载，在不同的文

献记载中几乎没有出入。在涉及他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中，《多明我会的菲律宾、日本、中国传教史》作者阿多阿德（Aduarte）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他述及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的两个事迹。其一讲述了一个奇迹：马约尔在菲岛期间一度想回老家西班牙阿拉贡省。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教徒对此事感到非常遗憾。就在马约尔预定启程日期的前两天，她夜不能寐，辗转反侧，起身做祈祷，祈祷他的告解神父马约尔不要离开马尼拉，此时眼前显现了圣母和一位教士的形象。圣母告诉她马约尔神父不会走，让她不要伤心害怕。这个显灵消失后，日本女人将信将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闻声而来的丈夫或任何人。马约尔神父一直对于任何人的请求和挽留都坚决回绝，尽管有很多人劝他留下。后来他开始有些犹豫是否离开菲律宾是个错误。于是在圣母像前祈祷，信仰的力量最终使他回心转意，决定还是留下。<sup>3</sup>

阿多阿德的《历史》中述及托马斯·马约尔的另一件事，就是1612年澳门主教平托来到马尼拉参加会议，对当地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中文水平感到大为惊叹，要求派出几位会中文的传教士和他一起回澳门。事实上，早在1611年的《我们时代的教会史》中，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就提及：平托主教作为多明我会修士已经向菲律宾同修会的传教士发出过邀请，请他们去澳门的多明我会修道院。该修道院是1587年西班牙多明我会阿赛迪阿诺（Arcediano）神父一行在澳门建立的<sup>4</sup>。但正如上文所述，托马斯一行的传教任务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他们遇到其他教派极大的排挤，而那些教派的神父在当地势力强大，极力阻止我们的人进入中国。我们的修士对其阻挠做过有力的抗争，最终感到无望进入中国，放弃继续尝试。马约尔神父取道西班牙，而巴托洛梅神父（即巴托洛梅·马丁内斯神父）则回到菲律宾教区。”<sup>5</sup>阿多阿德还提到马约尔和马丁内斯神父在澳门对一个临终的漳州人<sup>6</sup>施洗，在澳门主教的经济赞助下，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恐怕是托马斯入华一行唯一的业绩了。闵明我（Navarrete）在他的《过去与当今在中国传教的争议》中，也述及这次多明我会尝试入华传教的失败，他说：“尽管神圣的主教（此指澳门主教平托）做了很多努力，但耶稣会对他们的排挤如此之强烈，以致我们的两位传教士不得不放弃进入中国的计划。”这里明确指出阻挠多明我会修士进入中国的其他教派就是耶稣会。

<sup>3</sup> 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见上引书109-111页。

<sup>4</sup> 1587年多明我会刚刚在菲律宾建立传教区，就以对华传教为最终目的，因而当年派出了Antonio de Arcediano, Alonso Delgado和Bartolomé López三位神父赴华。他们登陆中国后被转移到澳门，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多明我会修道院。但很快被当地政权和其他修会赶出中国，转移到印度果阿。Arcediano神父派出其他两位同伴赴罗马申诉，但杳无音讯。此次赴华以失败告终。参阅代国庆，2014，圣母玛利亚在中国[M]。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56。

<sup>5</sup> 关于此事的记载见Aduarte: *Hl storia*, 414-415。

<sup>6</sup> 当时马尼拉的大部分华人来自福建该地区，他的洗礼由托马斯等神父完成，主要是因为他们熟悉他的方言。

#### 四、关于马约尔修士生平有分歧的问题

##### 1. 托马斯·马约尔到达马尼拉的时间

总揽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的所有相关文献，托马斯生平履历存在几个分歧或疑点。首先，不同于其他文献作者的说法，瓦伦西亚文献学家希梅诺（Ximeno）认为马约尔是1588年到达菲律宾的，是该教区的缔造者之一。这一观点是明显有误的，马约尔1602年抵达马尼拉应该是确定的事实。

希梅诺引述了阿多阿德《历史》中的圣母显灵奇迹，他可能是由阿多阿德的著作揣测马约尔是1588年左右就到了马尼拉，因为这段轶事出现的位置在该书中比较靠前，前后章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确均是1588年左右的事情。

但事实上阿多阿德在述及此事的时候，并没有指出明确的时间，只是说日本女人祈祷的那晚是九月4日星期一，托马斯要启程的前两天。而且该章节的题目是“教区如何教化中国人，以及这里发生的一些事”，并不是局限于哪一年的事件。

在阿多阿德的《历史》中，出现涉及马约尔修士的圣母显灵奇迹的同一章，还讲述了菲律宾第一位华人出版商（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维拉（Juan de Vera）的死。而根据费尔南德斯（Alonso Fernández）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史》（1611）中的叙述，维拉于1602年在多明我会神父布兰卡卡斯（Fr. Francisco Blancas）的协助下开创了菲律宾最早的印刷业，并出版了他加禄语的《圣母玫瑰经》。

可见，虽然阿多阿德关于日本女人与马约尔修士的奇迹事件在比较靠前的章节叙述，但该章的内容并不是局限于1588年前后的事情。希梅诺作为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文献学家，对于马约尔来到马尼拉的日期可能没有获得菲律宾的一手档案材料，因而对马约尔到达菲律宾的日期产生了一些误解。

就此一问题，我们更倾向于相信1891年在马尼拉出版的《神圣罗萨里奥教区教士生平概述》，因其基于菲律宾马尼拉当地多明我会修道院的档案，在托马斯·马约尔到达马尼拉的日期为1602年四月末这一点上绝不可能失误。

##### 2. 马约尔修士是否死在从澳门回西班牙的途中

另一个疑点在于托马斯修士是否在回西班牙的途中死去。最早持此说法的是菲律宾的多明我会修士白盖罗（P. Juan Peguero）。他1690年整合菲律宾各个修道院的旧档案，编纂了《菲律宾神圣罗萨里奥教区历史概要》的手稿，其中讲到托马斯修士“从澳门回欧洲报告该情况，以期得到解决，在回程的路上去世”。

但是1721年出版的《多明我会作家》的作者凯蒂夫（F. Jacobus Quetif）和埃查得（F. Jacobus Echard）却持保守看法：“……面对其他修会强大的阻挠，巴托洛梅修士返回马尼拉。托马斯修士用信仰教化了几个来澳门的幸运的中国人，并给他们做了洗礼。而后他返回西班牙。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此后他于何时何地去世。”

希梅诺在《瓦伦西亚作家》（1747年）一书中参考了阿多阿德和埃查得等人的作品，在他对马约尔生平的描述中，添加了如下信息：“在一份哈蒂瓦市的手稿中我读到，1618年他仍活着，让6000人皈依了天主。为了昭示他的圣洁，他垂死的脸被画得像天使一样。”可见对希梅诺而言，托马斯并没有在回西班牙的途中死去，而是回到了老家继续布道。

尽管希梅诺言之凿凿，1891年出版的《神圣罗萨里奥教区教士生平概述》却坚持白盖罗的说法，认为托马斯在到达欧洲之前，就在1612年遇难，他的死“让印度的葡萄牙人深为感恻。”1895年出版的《神圣罗萨里奥教区教士生平概述简编》自然支持了奥西奥（Hilario María Ocio, 1891版《生平概述》的作者）的说法，指出“他在哪里去世的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是在旅途中，在葡萄牙人管辖区域内……”

到目前为止，托马斯神父到底是否在1612年回西班牙途中去世显得扑朔迷离，更没有任何文献表明他的死因。由于白盖罗的手稿和希梅诺声称读到的哈蒂瓦市手稿笔者都未亲眼见到，因而很难确定二者的说法谁更可信。不过可以肯定，二者之中一定有一方弄错了。

在菲律宾多明我会这方面，白盖罗之后，又有几次在马尼拉出版教士生平概述（1891年奥西奥《概述》，1895年曼萨诺《简编》），他们一致认为马约尔修士死在回程路上，而且提到了“印度的葡萄牙人”，“在葡萄牙人的管辖区域”（见上引文）。我认为这些信息不像空穴来风。同为马尼拉的多明我会修士，后作者在编修同一性质的作品时参考前述者是很自然的。因此我相信1891年和1895年的《教士生平》一定参考了白盖罗1690年的手稿，或许还有一些多明我会内部往来于东亚各教区的信件档案。白盖罗的著作发表于1690年的马尼拉，而希梅诺的则是在1747年的瓦伦西亚，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包括在叙述的风格上，我认为白盖罗的说法都更可信一些。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相关文献中，再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过是对历史文献的引述而已，因此在这里不作涉及。

## 五、马约尔修士的作品

### 1. 《格物穷理便览》（*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china*）

关于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的最后一个谜团就是他的作品。首先，确凿无疑地存在一部作品，那就是《格物穷理便览》（西语名*Símbolo de la fe en lengua china*）。最早提到这部作品的史书是1611年费尔南德斯的《我们时代的教会史》：“多明戈·尼埃瓦修士也是出自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巴布罗修道院。他创作了《僚氏正教便览》（*Memorial de la vida Chrisitana*）。托马斯马约尔神父，阿拉贡省的奥利维拉学院毕业生，著有《格物穷理便览》（*Símbolo de la fe*）。在这些书中上述神父用人类的认知力和自然法则来论述基督教义的好处，他们以其渊博的知识，清楚地展示了我们神圣信仰的

主要信条和奥妙。”自然，费尔南德斯在他1627年的作品中也提到了这个书名，该作者并没有提及托马斯·马约尔修士有其它著作。

闵明我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托马斯·马约尔神父的著作，而且给出了值得注意的信息，只是他没有明确指出书名，而且在他的《争议》中，无论是在56页提及马约尔的作品时，还是在419页提及他去澳门传教的经历时，都将其名字错写作胡安：“胡安·马约尔神父，中国人的杰出的牧师，住在马尼拉，用中文出版了两卷的著作。这两卷书被带到中国，那里的传教士觉得它非常好，因而在后来两次重印。”闵明我提到的这两卷书是否《格物穷理便览》呢？我们知道，《便览》由三卷构成，或许被带到中国的是其中两卷？亦或许闵明我并没有亲自看到过原作，因而无法准确地说出书名。后来在中国的两次重印仅仅重印了其中的两卷亦有可能。

## 2. 《圣母玫瑰经》(*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洛佩斯神父(F. Juan López)在他1615年的著作《圣多明戈及其修会总史(第四部分)》中提到：“托马斯·马约尔神父用中文出版了《圣母玫瑰经》。”西班牙文献学家尼古拉斯·安东尼奥在他1672年的手稿《新西班牙书志》中表明，《圣母玫瑰经》可能是《格物穷理便览》的另一个书名，二者其实是同一本书。<sup>7</sup>就这一猜想，笔者持保留意见。因为《格物穷理便览》通篇没有《圣母玫瑰经》的内容。而这一文本在多明我会的海外传教活动中，基本是以标准统一的结构和内容被翻译成各个教区的当地语言。

事实上，在菲律宾该时期的出版物中我们今天的确能找到中文版的《圣母玫瑰经》，但不是附在《格物穷理便览》中，而是在另一部作品《基督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之后。范德龙(Van der Loon)从印刷、语言特征和菲律宾传教、出版历史等侧面论述了《基督教义》事实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圣母玫瑰经》与前面的《教义》部分很可能不是同时期创作刊刻的，他认为该书两个部分加起来的成书时间不早于十七世纪的头几年。《基督教义》前面的《教义》部分应该是由高母羨(Juan Cobo)在贝纳比德斯(Benavides)的原稿基础上修改，最终经由尼埃瓦校对整理。这一过程从多明我会在菲律宾传教的最初几年就开始了。至于《圣母玫瑰经》，范德龙认为它正是在托马斯·马约尔创作《便览》的那些年被刊印的。如果细读《基督教义》这个菲律宾出版的中文刻本，会发现范德龙的研究非常贴近事实。《圣母玫瑰经》中出现的基督教术语和1606年出版的《僚氏正教便览》，以及1607年出版的《格物穷理便览》基本一致。

<sup>7</sup> 该手稿1696年由José Saenz de Aguirre主教整理在罗马出版，更完善的版本请参阅1788年马德里出版的：Antonio Nicolas Hispalensi. 1788. *Bibliotheca hispana nova sive hispanorum scriptorum qui ab anno MD ad MDCLXXXIV floruerunt noticia*. Madrid: Apud Viduam et Heredes Joachimi de Ibarra, 307.



《基督教义》的封面上并没有注名是哪一年出版，仅指明在马尼拉华人聚居区八连（**Parien**）出版。关于作者的提示惟有“多明我会神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文本产生的过程比较复杂，很可能是集体创作的。雷塔纳等二十世纪初的研究者认为该书是1593年和他加禄语版的《基督教义》同时出版的，作者无疑是高母羨。这种说法主要基于当时的菲律宾总督达斯玛利尼阿斯（**Dasmariñas**）写给菲利普二世国王的信，其中提到了1593年出版了中文版和他加禄语版的《基督教义》。而当时在马尼拉能用中文写作的只有高母羨和贝纳比德斯。根据主教萨拉萨尔（**Salazar**）的信笺，前者的中文水平要高于后者。然而随着高母羨的作品《辨正教真传实录》一书在二十世纪中叶被发现，总督信中提及的中文教理出版物很可能是1593年出版的《实录》（该书封面上已标明是1593年出版），而非《基督教义》。信中提及中文版的《教义》定价四雷阿尔，恰好和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实录》藏本上写的标价一致。基于此，我们如今所见的中文版《基督教义》是否在高母羨的时期出版，就成为可推敲的问题了。

综上，笔者认为，附在《基督教义》其后，占较大篇幅的《圣母玫瑰经》很可能是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的另一部作品。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洛佩斯神父把马约尔的作品名称弄错了，毕竟他出版的《总史》基于二手的资料，他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在该书第五部分中，他坦陈他的作品是有限的，因为他没有多明我会所有教区会众的资料。

### 3. 《教义问答》(Catecismo)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奥西奥在马约尔神父的生平介绍中，并没有提到《格物穷理便览》一书，而是说“他用中文撰写了一本题为《教义问答》(Catecismo)的书，该书不仅包涵内容广博，而且非常实用有益。”

从奥西奥对该书的描述来看，除了标题与《格物穷理便览》不吻合，该书的其他特征都非常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格物穷理便览》：首先，《便览》中时而以问答的形式讲解教理。虽然不是通篇如此，但第一卷到第三卷皆有“或问曰”“汝必问曰”“我答曰”“予答曰”等语句。而在西语字典中，“catecismo”的意思就是“往往以问答形式介绍基督教基础教理的书籍”。<sup>8</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便览》的确可被称为一部问答教理著作。其次，奥西奥说《问答教理》以中文写成，这也与《便览》一致。再次，《便览》三卷十四万字的篇幅也符合他“内容广博”的描述。那么《问答教理》会不会就是《格物穷理便览》呢？但是，奥西奥指明该书书名为《问答教理》，这一点又令人怀疑上述猜测的准确性。

<sup>8</sup> 参见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字典。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奥西奥在撰写他的《神圣罗萨里奥教区教士生平概述》（1891年）时，《格物穷理便览》在菲律宾是找不到藏本的，因为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古籍资料，可以肯定《便览》上绝对没有出现《问答教理》的题名。

#### 4. 手稿

关于托马斯·马约尔的作品，我们所得到的有价值的讯息恐怕只有这些。雷塔纳还报道了马约尔神父的一份手稿：“1603年在中国教民牧师任上发生的罕见事件”。该手稿有20页。冈萨雷斯神父指明该手稿是一份报道，内容涉及某个和日本女人结婚的中国教民，以及弗朗哥·德·圣何塞神父施洗的虔诚的中国教民。

#### 六、结语

研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离不开对传教士及其作品的研究。对于《格物穷理便览》这部十七世纪初的中文传教巨著，中国的学者由于难以触及藏本而鲜有关注。而回顾海外学者对该书作者马约尔修士的记述，十九世纪以后的学者研究时往往基于前人著作的记叙，而缺乏对刻本的考察，由于隔着几个世纪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也难以作出确切的报道。总揽提及托马斯·马约尔修士的文献，可发现其生平和作品仍然有许多疑点和空白。要进一步加深对该修士的了解，必须借助其在任时期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其作品的文本分析，更多了解这位西班牙汉学家的思想和经历。

#### 参考文献

- Aduarte, Fr. D., & González, Fr. D., 1640.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Japón y China*. Manila: Luis Beltran.
- Fernández, A., 1611.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nuestros tiempos*. Toledo: Viuda de Pedro Rodríguez.
- , 1627. *Historia y anales de la devoción, y milagros del Rosario desde su origen hasta año 1626*. Libro IX. Madrid: Iván González.
- González, Fr. J. M., 1964.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1632-1700*, Tomo I. Madrid: Imprenta Juan Bravo.

- Hispalensi, N. A., 1788. *Bibliotheca hispana nova sive hispanorum scriptorum qui ab anno MD. ad MDCLXXXIV floruerunt noticia*. Madrid: Apud Viduam et Heredes Joachimi de Ibarra.
- López, Fr. J., 1615. *Quarta parte de la historia general de Santo Domingo y de su Orden de Predicadores*. Valladolid: Francisco Fernández de Córdova.
- Manzano, Fr. B. Á., 1895. *Compendio de l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to. Tomás.
- Navarrete, D. F., 1679. *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 misión de la gran Chin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Madrid: R/2012, <http://catalogo.bne.es/uhtbin/cgisirsi/?ps=hujv2lj3Gl/BNMADRID/177590489/9>. Ref. 2018-11-23.
- Ocio, Fr. H. M., 1891.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Manila: Imprenta del Colegio del Santo Tomás.
- Ocio, H. & Neira, E., 2000. *Misioneros Dominican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1587-1835*. Manila: Orientalia Dominicana General.
- Peguero, P. J., 1690. *Compendio historial de la Provincia del SS. Rosario de Filipinas*. Manuscript. Arch. De Provincia: 5. 295.
- Quétif, F. J. & F. Jacobus Echard. 1721. *Scriptores ordinis Praedicatorum*, Tomo II. Paris: Lutetiae Prisorum.
- Retana, W. E. 1899. *La imprenta de Filipinas 1593-1910*. Madrid: Imprenta de la Viuda de M. Minuesa de los Ríos.
- , 1911. *Orígenes de la imprenta filipina: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bibliográficas y tipográficas*. Madrid: Librería General de Victoriano Suárez.
- Van Der Loon, P., 1969.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In Walter Simon (ed.) *Asia Major: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New Series 21. London: Percy Lund Humphries & Co. Ltd.
- Ximeno, P. V., 1747. *Escritores del reino de Valencia*. Tomo I. Valencia: Joseph Estevan.
- 代国庆, 2014, 圣母玛利亚在中国[M]。台湾: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 [明]高姆羨 (Juan Cobo), 1593, 基督教义[M]。菲律宾马尼拉: 龚荣。
- [明]罗明坚 (Ruggieri, Michele), 1584, 天主圣教实录[M], 肇庆。

